



政略思维在军事领域的方法论意义

□ 张丙辰 张子琪

政略思维方法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一种重要思维方法。习近平主席指出，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问题。这一论述，深刻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贯穿着政治决定军事、政略决定战略的大逻辑。

政略思维要求认识和把握军事问题必须以达成政治目的为根本的价值导向，以政治目的实现程度为检验标准。政治对军事的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战与非战的定夺、战争目标的确定、战争方式的选择等，从根本上讲并不完全取决于战场上敌对双方兵力、兵器等的对比情况，而是取决于双方的政治目的和政治需要。军事指挥员必须善于从政治高度思考把握军事问题，准确把握本国政府的战略方针和决心意图，准确把握军事斗争的政治背景、政治意图、政治底线，打还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目的。有时候从军事上看有利，但如果政治上不允许，那也不能轻率行动；反过来，如果政治上需要，即使军事上有困难和风险，也要坚决行动。

另一方面，衡量一场战争的成败得失，固然要看敌我伤亡比例的大小、弹药物质消耗的多少，但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政治标尺来衡量，就是要看这场战争对政治目的的实现情况。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作为战争最初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当年毛泽东称赞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军事仗”，绝不

仅仅是因为我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毙俘印军 8700 余人的骄人战绩，而主要是因为此次作战圆满达成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预先确定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标，即此次作战既要打退打狠打痛侵略者，夺回被蚕食领土，但又不能打大，特别是不能打成持久战，造成我政治外交的战略被动。我军未来遂行的联合作战，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的指向性更加鲜明，军事行动的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显著增强，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拓宽政治视野，防止和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既要有军事头脑，更要有政治头脑，既要考虑打好军事仗，也要考虑打好政治仗，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

政略思维要求认识和把握军事问题必须以实现整体性、长远性、根本性利益为目标追求，而不计一城一地一时之得失。政略思维作为全局性思维，强调要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并通过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来实现全局性、长远性目标。古人讲，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尤其需要强化全局性思维，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远看近、未雨绸缪，着眼国家政治外交大局和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处理军事问题，做到动静有序、进退有矩。毛泽东认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全局和各个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失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现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在实现快速发展、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风险挑战。越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我们越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处理好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把战争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不能出现战略性失误。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艺术，从战略指导和思维方法角度来看，就体现了全局性思维的鲜明特征。

我军未来遂行的联合作战，军事和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战略层面的相关性和整体性日益增强，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号令意识，坚决克服本位主义的思想羁绊，自觉把军事问题放到党和国家的大局中去思考和定位。上级让“攻山头”，能豁得出、打得赢；让“守堡垒”，能守得稳、挺得住。遇到危机事件，头脑不发热、行动不冲动，避免因军事冲动、擦枪走火造成国家政治外交上的被动。

政略思维要求认识和把握军事问题必须讲究斗争方略、增强斗争艺术、把握斗争节奏，决不能乱拳出击、盲目蛮干。政略是本，策略是目，策略从来都是为实现政略服务的。离开策略的支撑，政略只能成为挂在墙上的空泛愿景。毛泽东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自古以来军事领域就是策略性思维运用最为广泛、最为生动、最具创造性的领域。这种策略性思维强调，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之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对力量、重点、时机、方式等要素的运筹，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乃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策略性思维可分为全局性策略思维、局部性策略思维和战术性策略思维等不同层次。比如，在

科学编制“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全国体育系统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科学编制好“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将体育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准确研判未来体育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对标新发展格局，不断增强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体育发展新动能。深化关键问题研究，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扎实开展专项课题调研，切实找到解决问题的良策。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汇集民情民意，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和力量，将社会各界对体育的期盼和老百姓的迫切需求摸清摸透，在编制规划过程中予以充分吸收。统筹

和冲击。对此，必须未雨绸缪，主动求变，积极“化危为机”。从问题导向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着力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上想办法，必须在补齐各种短板、弱项上出实招，必须在进一步放宽管制，激发市场活力上多用力，使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都畅通高效。首先，促进国民经济循环上要找准重要淤点堵点，做好“畅通”这篇大文章。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把重点放在以下方面：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如何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就是一个全局性策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之中，把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作为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重要途径，把军政军民团结作为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重要政治保证，从顶层设计上为实现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发展制定了一整套全局性方略。又比如，在与主要战略对手进行军事博弈时，如何处理好捍卫国家主权尊严与维护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关系，属于局部性策略的范畴。这一策略的实践要求是，要把握好捍卫国家主权尊严与维护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之间的平衡，特别要注意防止在军事行动中因“用力过猛”导致冲突升级，把局部问题搞成全局性问题，并由此带来国家在战略全局上的被动。再比如，在军事行动中，如何着眼政治需要来选择合适的方法手段和规模力度，就属于战术性策略的范畴。

我军未来遂行的联合作战，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相互交织，舆论争夺、法理斗争和心理攻防更加激烈，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提高思维层次、强化策略意识，特别是在与战略对手博弈互动时，要基于政治效果处理军事问题，明确“底线”和“红线”，做到当打则打、当止则止，确保以我为主、保持主动，力求实现军事目的与政治目的的统一；要基于底线思维设计方案预案，坚持预置在先、对等反制，做到既不妥协退让，又不盲目冒进，力求实现维护国家主权尊严与预留回旋空间的统一。

加强规划体系建设，指导体育各领域、各项目以及各地编制好专项体育规划和地方体育规划，形成相互支撑、衔接有序的规划体系，全方位、一体化描绘好“十四五”体育发展的新蓝图。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始终与国家发展融为一体，始终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新时代新阶段党和人民对体育的呼唤愈加强烈，对体育“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感受更加深刻，体育必将以其独特的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聚焦建成体育强国的战略部署，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坚强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时不我待、真抓实干，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完成新时代新阶段党和人民赋予体育人的光荣使命。

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贸、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其次，在补短板、强弱项上，要更加有力，更加注重机制建设。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等领域短板；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补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发展不足等短板。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等。最后，进一步放松管制，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要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新发展格局的加快形成。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官兵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根据国内的革命战争经验，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杀敌立功运动，成为鼓舞志愿军斗志、战胜强敌的有力精神武器。

积极开展立功创模保家卫国运动

进行部队光荣传统教育，激发官兵创立新功的热情。一是典型事迹法。将邱少云、杨连弟、黄继光等英模人物和本单位历史上的英模个人、集体的典型事迹编印成小册子，对官兵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激励官兵向英模学习。二是回忆荣誉法。结合战前动员将本单位的战旗、奖旗、奖牌挂出，战士们佩戴军功章，集体回忆光荣战史、缅怀英雄事迹，订立立功计划，提出“巩固历史荣誉、创造新荣誉”的口号。三是战例激励法。用战例教育官兵，启发荣誉感，激励斗志。通过广泛细致的光荣传统教育，广大官兵认识到，这个仗应该打，只有抗美援朝，才能保卫祖国的安全、朝鲜的独立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这个仗能够打，只要扬我之长、击敌之短，避我之短、抑敌之长，就能战胜美帝国主义，取得战争胜利。

广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首先加强对立功运动的领导。战争初期，许多同志对立功运动存在模糊认识：有的认为是“单纯的鼓励工作”“是政工人员的事”，有的认为“要求太高了，没法立功”，等等。志愿军政治部立即统一认识，将立功运动当作政治工作经常性的制度，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同时认真掌握立功运动中的记成绩、评功、批功、奖励、爱功、宣功等具体步骤。其次开展“集体立功”。提出“集体立功”号召，只要共同完成一个战斗任务，合乎立功标准，所有参战人员都有立功机会。战争后期，官兵立功热情高涨，志愿军政治部提出“练好兵”“生产好”“互助好”“学习好”“遵纪好”等也可立功的号召，更加鼓舞了官兵立功热情。

根据作战任务特点确定立功要求

结合各时期任务明确立功要求。一方面，根据不同时期提出立功要求。在运动战阶段，要求部队敢于实施突破、穿插、迂回、包围，敢于孤胆作战，敢于在敌机、敌炮轰击中坚守阵地，歼灭敌人，在战斗中涌现出冷树国、刘光子等英雄。在阵地战阶段，美军依靠其海空优势发起重点攻击，志愿军提出“坚守阵地立功”“狙击杀敌立功”“筑城找窍门立功”口号，涌现出胡修道、黄丑和等英雄。在小分队活动与冷枪冷炮狙击运动阶段，提出“创造杀敌百名的狙击手、神枪手、神炮手”号召，开展杀敌立功大竞赛，涌现出狙击英雄张桃芳等。另一方面，根据不同任务提出立功要求。在情况瞬息变化的战场上，志愿军提出坚守阵地立功、敌炮火下紧急构筑工事立功、抢送伤员和弹药立功，涌现出“穿插模范营”“对空射击英雄班”及孙占元、葛洪臣等英雄。

针对不同军兵种明确立功要求。志愿军工程兵指挥部提出完成任务好、爱护器材、节约材料都可立功，工作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志愿军炮兵部队提出“炮手随叫随打，及时准确，不怕疲劳；电话员随叫随应，随断随接，保证线路畅通；要求观察员英勇机智，搜索敌人，不失战机；报告员随联络随通，保证及时传达口令”等立功要求，启发了炮兵部队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涌现出金耳世等英雄。在运输部队，为冲破敌人封锁，志愿军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性反轰炸斗争。各部队及时纠正“战勤工作不光采”“运输工作不易立功”错误认识，开展“四爱一反”“五项立功运动”等，涌现出优秀司机沈荣国、杨明忠等模范。

开展干部和机关人员立功运动。针对在立功运动中出现的重战士不重干部、重连队不重机关的问题，志愿军政治部积极在干部和机关人员中开展了立功运动。一方面加强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对干部和机关人员立功运动的重视。根据机关工作的具体特点，提出立功标准应着眼于“根据职责范围，安心工作，积极负责，钻研业务，工作有良好成绩者”，使干部和机关人员成

志愿军的立功运动

□ 肖建湘 王培志

为部队立功运动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建立干部与机关人员立功制度。志愿军政治部要求：“机关可以部、处、科、股订出个人或单位的立功计划，建立经常的记成绩制度，按期总结作为评功依据。”形成人人立功、事事立功的良好局面。

准确及时组织部队官兵评功批功

统一志愿军部队的立功标准。入朝初期，因没有统一的立功标准，形成了各搞一套、标准不严的现象。为适应现代化作战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激发广大官兵的作战热情，志愿军政治部于 1951 年 4 月颁布《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条例（草案）》，统一了全军的立功标准和评功、报功、批功、奖励、贺功的步骤以及授予各级英雄称号的做法。为表彰有功人员，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进一步激发官兵荣誉感，中国政府和志愿军除颁发大量战斗英雄奖章和功臣奖章外，还颁发了“抗美援朝”“和平万岁”等多种纪念章。

教育部队准确掌握立功标准。坚持民主评功和领导批功相结合。功臣和英模由所在单位的广大群众民主推选，事迹经过群众反复核对讨论，使大家心服口服。制定具体的评功程序。纠正不实事实是的好大喜功的偏向；评功时要听取群众意见，连队坚持民主评议，团以上机关评功、批功要吸收有关部门干部参加；逐级批功时，应认真负责反复审查；报功材料要做到真实、具体、全面。制定统一立功标准的规定。评功要充分发挥民主；在战评基础上进行；不仅局限于战斗，遵纪、互助、练兵、行军、防奸反特、瓦解敌人等工作有突出成绩者都可评功。

保证部队评功、批功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为保证立功的准确性，防止漏报、漏评和漏批，志愿军各部队坚持了民主评功与领导批功相结合的做法。同时注重边打边评，保证评功、批功的及时性。评功、批功不仅要求准确，而且要迅速。战时人员调动多、伤亡大，迟缓就会事过境迁，削弱鼓舞士气的作用，影响先进经验的推广，因此许多评功、批功在战斗过程中进行。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立功运动，极大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热情，鼓舞了志愿军保家卫国、战胜强敌的坚强决心和斗志，增强了部队团结友爱和整体观念，密切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增强了部队内外团结，使广大官兵在作战中积极配合、互相支援，最终赢得了伟大胜利。

